

融通三教 师法自然

苏轼自然观



首次系统论述苏轼的自然观，阐述苏轼的科学思想和科技方面的诸多贡献，弥补学术界研究苏轼文化遗产的不足。

李赓扬·著

『自然国学丛书』

第三辑

海天出版社 (中国·深圳)

苏轼自然观

融通三教
师法自然



李庚扬·著

 海天出版社（中国·深圳）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融通三教 师法自然 : 苏轼自然观 / 李庚扬著. — 深圳 :
海天出版社, 2014.2
(自然国学丛书)
ISBN 978-7-5507-0959-1

I. ①融… II. ①李… III. ①苏轼(1036~1101) —
自然哲学—哲学思想—思想评论 IV. ①K825.6②N0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17887号

融通三教 师法自然——苏轼自然观

Rongtong sanjiao shifa ziran Su Shi ziranguan

出品人 陈新亮

出版策划 尹昌生

丛书主编 孙敬龙 宋正海 刘长林

责任编辑 秦海

责任技编 蔡松琴

封面设计 风生水起



出版发行 海天出版社

地 址 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大厦 (518033)

网 址 www.htph.com.cn

订购电话 0755-83460293(批发) 83460397(邮购)

设计制作 深圳市同舟设计制作有限公司 Tel: 0755-83618288

印 刷 深圳市新联美术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3月第1次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2.5

字 数 159千

定 价 30元

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海天版图书凡有印装质量问题,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前 言

公元1037年（北宋仁宗景祐四年），苏轼出生。

当时的中国，历经唐末、五代、宋初战乱破坏和过度垦殖砍伐，自然条件已远不如汉唐盛世。就社会条件来看，宋代头两位皇帝，都是在宫廷突发事件中登基：太祖赵匡胤在陈桥兵变时黄袍加身，太宗赵匡义在兄长离奇猝死时继承皇位。因此北宋朝廷把防备武将干政放在了安全维稳的首位，一直奉行强干弱枝、重文轻武的总政策，结果“文治”兴盛，“武力”脆弱，对外只得退让妥协，无力恢复汉唐景象。尽管史学界在分析王安石变法背景时，用“积贫积弱”来论述北宋的国力，但是还应看到，徽宗、钦宗以前，中原、江南的形势总的来说还是比较稳定的，农业发展较快，手工业与商业比较发达，对外贸易已有相当的规模，文化教育比较兴盛，科学技术仍处于世界领先水平：《清明上河图》所描绘的首都汴梁繁华景象，活字印刷的发明，火药和航海罗盘的广泛使用，都可以作为佐证。

这就是苏轼所处的时代大环境。本书论述的中心是苏轼的自然观，但自然观是世界观的重要组成部分，要说清楚历史人物的自然观，必不可免地要联系到他的世界观，以及形成他的世界观、自然观的历史条件和社会背景。此外还要注重探究苏轼的性格特点、心灵轨迹、主观追求来揭示苏轼“这一个”人的本质。同时，我们不可忽视苏轼在顺境时的积极作为、在逆境中的各种抗争。

需要强调指出，苏轼才能如此卓著，成就如此多面，创新如此



奇异，贡献如此突出，影响如此深远，所以更应该重视他在面对升迁机遇或祸端磨难时独特的人生抉择。在几起几落传奇式的生涯中，苏轼没有辜负父母的教养，没有辜负眉山父老乡亲的期望，也没有辜负前贤欧阳修等人的栽培。他生前就被尊为“文坛盟主”，就有地方百姓为他建立生祠；身后“如天之星斗，地之山岳”（李绍著《重刊苏文忠公全集序》，《苏东坡全集》上册，中国书店，1986年版），受历代海内外人们的景仰。后来人们给他戴上的桂冠有：北宋最杰出的文学家，唐宋八大家之一，杰出的诗人，宋词豪放派的奠基人，北宋四大书法家之首、宋代文人画的开拓者等等。今天的人们对他的赞誉更多，说他是北宋政治家、思想家、哲学家、美学家、易学家、史学家，乃至养生专家、医药专家、美食专家、服饰专家、园林建筑专家、水利专家等等。

古今那么多文人学士、社会名流以及普通百姓，热爱苏轼，崇敬他高尚的人品，欣赏他不朽的杰作，有关苏轼研究的书籍、资料汗牛充栋，当代对其人其事其作品的探讨已相当深入，我们可以了解到苏轼的方方面面。

然而，学术界对苏轼的研究还是不够的。苏轼的自然观、科技观领先其所处时代，他对当时的科技进步和生产发展曾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一重要方面，我们认知不多，研讨不深，阐发甚少，取舍不清，学术界应当补上这一课。而且，当我们对这一重要方面做较为深入的研究后就会发现，我们对苏轼应给予更高的评价。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苏轼自然观产生的时代背景	1
第二章 苏轼的思想渊源	13
一、儒家思想	15
二、道家思想	27
三、佛禅思想	31
四、苏轼思想特点	38
第三章 论天道自然	47
一、宇宙的形成	50
二、宇宙的客观性	58
三、宇宙发展变化的无限性	62
四、宇宙发展变化的规律性	66
第四章 究天人之际	75
一、人类认识的主观性	77
二、得之于天	82
三、天人合一	87
四、人性论	96
第五章 好道进技	103
一、改进技术	105



二、抗灾救灾	112
三、兴修水利	119
四、苏轼的科技观	125
第六章 养生惜命	133
一、修身养性	135
二、调节饮食	142
三、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150
四、锻炼身体	156
五、防病治病	161
结束语	171
参考文献	173
索引	175

第一章

苏轼自然观产生的
时代背景



苏轼领先于时代的自然观和科技观，以及他在科技领域的贡献，不是凭空产生的，有其产生的时代条件和社会背景；而苏轼起伏跌宕的个人经历，也是他能在这一方面取得辉煌成就的决定因素。

苏轼（1037～1101），出生于四川眉州眉山一个中小地主家庭。其高祖以来，遗有贤明清高、仗义疏财、耿直豪爽、不畏妖邪的家风。父亲苏洵二十七岁始发奋读书，科举不中，以文章闻名于世；他对苏轼和苏辙教育有方，把传承家学与大济苍生的理想寄托在两个儿子身上。母亲贤淑慈爱，好读书，重气节。她的身教言教，铭刻在苏轼、苏辙的心里。

苏轼七岁时开始读书，八岁入小学，师从道士张易简。他天资超群，学习刻苦，十一岁所作《却鼠刀铭》就闪现出卓异的文学创作才能。稍长，父亲让他拜于多名乡贤耆宿门下，并带领他们兄弟二人游学于蜀地。他仰慕北宋名臣、诗文大家范仲淹、欧阳修等人，兴趣广泛，曾手抄经史，喜好诗文、书画、医药、道术，也曾往来田间，与牛羊相伴，且擅长种松。

苏轼二十一岁时与苏辙随父亲离开故乡，由陆路赴京师汴梁（注：今开封）应开封府省试，沿途饱览名胜古迹。在汴梁，住兴国寺浴室院，生活清苦，但兄弟二人以研读《春秋》为乐。苏轼还作诗谴责首都的奢靡之风，显示出他的人生价值观取向。嘉祐二年（1057）省试时，苏轼写下了《刑赏忠厚之至论》，阐述以仁义爱民宗旨处理刑赏，文风质朴，与当时流行的“险怪奇涩”的“太学体”文章形成鲜明对比，因此深受考官梅尧臣、欧阳修的赞赏，结果列置举人第二名。苏辙也同时中举。不久，在宋仁宗亲临监考的殿试中，二十二岁的苏轼和十八岁的苏辙皆进士及第。可就在兄弟二人名动京师之时，母亲程氏夫人仙逝，他们立即返蜀奔丧。守丧期满，苏洵带领苏轼和苏轼新婚妻子王弗还有



苏辙，由水路再次出川。他们沿江而下，陶醉于山川的雄伟壮丽，游览历史名城，探访古贤足迹，察看风土人情，受益匪浅。到京师后，苏洵受命与人一起编修宋代礼典。

进士及第后，苏轼、苏辙未接受所授官职，经举荐参加为选拔特殊人才而不定期举行的最高级考试——制科考试。结果，苏轼被擢为制科三等，苏辙入四等。后来宋英宗时，苏轼又参加了一次为他一人举行的制科考试，仍获三等。获两次制科三等，这在两宋三百多年历史上仅苏轼一人。科举成绩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苏轼卓尔不群的文才。

苏轼不仅是个文人，而且是个关注民生的实干家。嘉祐六年（1061）年末，二十六岁的苏轼到达陕西凤翔出任辅佐知府的签判（注：掌管官府公事）。他曾上书请求免去贫民亏欠官府的债务，释放拘押的欠债人；在供应修建仁宗陵墓所需石材的徭役中，他精心筹划，督导指挥，竭力减轻民众劳苦；在驿站听到哭泣，他便作诗感叹贫富差距，又结交贫者（注：如董传、杨耆、马梦得），尽其所能帮助他们。此期间，他与道士往来密切，曾读道藏；还受笃信佛教的监军王彭影响，开始研读佛经。西北边境军情告急，他除做好凤翔的后援工作外，还练习骑射，怀投笔从戎之志。在凤翔，苏轼虽是初次仕宦，但已充分显示了他的思想作风：胸有全局，廉洁勤政，不唯上，以改善民生为己任，务实实干，兴利除弊，接近贫苦百姓，处事灵活果断，与多数同僚关系融洽。这次历练，为他逐渐形成自己的自然观、科技观打下了思想基础，也锻炼了经纶民生的能力。

英宗治平二年（1065），苏轼在凤翔任官期满回到京城，曾任职直史馆（注：掌修国史的机构）。这时家庭遭遇不幸，先是妻子王弗年仅二十七岁离世。事隔不到一年，刚刚合作完成百卷《太常因革礼》编修的父亲苏洵病笃西去，享年五十八岁。苏轼、苏辙舟载灵柩返乡安葬。苏轼兄弟依制为父亲守丧三年，期满已是神宗熙宁元年（1068）七月。之后，苏轼续娶王弗的叔伯妹妹王闰之为妻。

苏轼再到京师，政治形势突变。宋神宗重用王安石为相，历史上

震惊百代的王安石变法开始。苏辙由于皇帝召见时应答符合上意，被派往执掌新法的“三司条例司”，任检详文字（注：文字秘书），而苏轼则被授予清闲职务。神宗召见苏轼，苏轼直言极谏，指出新政之失。尽管苏轼一再申明，自己不是反对变法，只是在具体措施、任用官吏、变革速度等方面另有思考，意欲克服新法及执行过程中的一些弊端，但他还是被卷进了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和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激烈争斗的漩涡之中。苏辙先被排挤，改外任。不久，苏轼受任矛盾丛集、工作棘手的开封府代理推官。新党意在捕获苏轼过失，以便处置。没想到，苏轼决断精敏，表现出不凡的行政才能。在地方任职，苏轼看到了施行新法的种种弊端，再次上书神宗皇帝，直言不讳地说：“所行新政，皆不与治同道。”^①神宗未听从，也未降罪，即派苏轼任殿试编排官（注：拟殿试考题供选择）。后苏轼被诬告，但举报不实，仍被任命为太常博士（注：掌管礼仪）。他自知与新党官员难处，在京师也不可能有所作为，于是要求外放。

熙宁四年（1071）六月，苏轼出任杭州通判（注：副行政长官），一度代理知州（注：州行政长官）。赴杭途中，在陈州与苏辙相聚，在颍州（注：今安徽阜阳）拜谒已经退休的欧阳修。转年，他的三子苏过在杭州出生。他曾冒着酷暑巡行所属州县，奉命赴浙北湖州评估维修松江大堤工程。熙宁六年（1073），苏轼协助太守陈襄筹划疏浚废坏了的西湖六井及沈公井，完工后适逢大旱，而井水充足。苏轼在民间访问，听到苦于运河淤塞的抱怨，便萌生了疏浚运河和西湖的想法，就与当地父老探讨治理思路。这一年，他前往常州、苏州等地赈济饥民。苏轼还接待过进贡路经杭州的高丽使者。他舍母亲簪珥于净慈寺，与僧人禅师过从甚密，家里还纳十二岁的歌女王朝云为侍妾。这期间他写了很多反映民间疾苦和赞美杭州等地风景名胜的诗文，兴修水利的指导思想已具雏形。

熙宁七年（1074）九月，苏轼升任密州（注：今山东诸城）太守。

^①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第二册，第749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后续引文只简化注释。



发现当地爆发蝗灾，他立即上书请求蠲免税收。他在密州实施由新法发展而来的给田免役法，觉得这项新法便民，呼吁不可废止。他还机敏地处理了捕盗士兵滥杀无辜、欲为暴乱的事件。三年后，苏轼转任徐州知州。到任不久，黄河在澶州（注：今河南濮阳）决口，洪水东下，直扑徐州。在危急时刻，苏轼制止了富户出逃，亲赴军营动员驻军筑堤护城，并派下属分段把守。四十二岁的苏轼日夜值守在城上，过家门不入；同时打开官府仓廩，救济贫困。经过一个半月的苦战，洪水渐渐退去。因抗洪有功，苏轼荣获皇帝嘉奖。这时他提出修筑石堤防洪，但只获准修成本桩堤岸，并改建外小城，修复损毁的石桥。他在访查中发现了徐州蕴藏石炭（注：煤），欣喜地称之为“遗宝”。

元丰二年（1079），苏轼调任湖州知州。到任才三个月零八天，“乌台诗案”事发。皇家使者宣布罢免苏轼之后，立即押解苏轼上路，把苏轼关进了中央监察机构御史台（注：即乌台）的大牢。苏轼因何事而入狱呢？当年七月，御史中丞（注：御史台主官）李定等以苏轼诗文诽谤朝政为罪名，弹劾苏轼，陷苏轼于文字狱。狱中苏轼受到了乌台官吏的严词逼供，甚至被体罚，新党要将他置于死地。幸亏苏辙自请纳官，以赎兄罪；旧党中元老级的人物也奋不顾身，出面营救。新党领袖王安石尽管已被他亲手提拔起来的吕惠卿排挤出朝赋闲，他还是进言：岂有盛世而杀才智人士的道理！太皇太后曹氏辞世前两次要求释放苏轼，号称“纯孝”的神宗不能不听从祖母的意见，神宗本人也确无杀苏轼之意。苏轼坐了一百三十六天大牢，被责授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虚衔，安置于黄州（注：今湖北黄冈），不得参与公事，不发俸禄，只给生活费。“乌台诗案”使苏轼身心都受到了折磨摧残，但他是个坚强豁达之人，他的宇宙观、人生观更加坚定成熟。

元丰三年（1080）二月初一，苏轼到黄州，吃住在佛寺，饮食极为简单，每日端坐反思，抚慰自己的心灵创伤。五月，家属到了黄州，生活便成了问题。忠厚的太守陈轸及时援手，一直追随苏轼的穷秀才马梦得找到城东一块废弃营地，在当地父老乡亲帮助下，经过艰辛的开

辟整治，建起了家庭农场。从此苏轼率家人亲自耕种，并自号“东坡居士”。雪后，苏轼在东坡一隅，修建了五间草房，谓“雪堂”；周围农夫都来帮忙，有的还送来梁檩，使他感到民间无比温暖。在一些旧友与他“划清界限”之时，开小酒店的潘丙、卖药为生的郭遵、隐士古耕道等人，与他结为密友。“贫甚”的杨耆专程从四川来黄州看望他。苏轼从佛老思想汲取了精神营养，从辛勤耕耘与结交下层朋友、亲近大自然中获得了无穷乐趣，又恢复了自信自豪。物质匮乏，但他改进烹调技术，千方百计地让家人和朋友吃得好些。有了闲暇时间，他经常泛舟于附近的长江，甚至到稍远的武昌等地游山访友。长江两岸壮阔秀丽的山川，陶冶着他的性情。感悟天道自然、阐发人生哲理的韵文《前赤壁赋》和《后赤壁赋》，都是这时创作的。这一时期苏轼的文学创作达到了平生最高峰。也有伤心事：从小哺育他的乳母任采莲，在为苏家辛勤操劳了五十九年之后溘然长逝。苏轼性格很像乳母，耿直勤劳。苏轼含泪写下了《乳母任采莲墓志铭》，在离开黄州时还谆谆嘱托好友照顾好乳母的坟山和东坡的田园。流贬生活，使苏轼更加贴近百姓、贴近实践。

元丰七年（1084），朝廷下令将苏轼移至河南汝州安置。任职筠州（注：今江西高安）的苏辙与两位禅师出城迎接，兄弟团聚数日。到南京，王安石亲自去码头与小他十六岁的苏轼相见。苏轼住了一个半月，多次拜会晚年的王安石。尽管苏轼与王安石政见不同，彼此也有许多隔阂和误会，但两人也互相佩服文才。此时王安石早已不再过问朝政，而苏轼也被流放编管。两人都经历了官场的浮沉，自然增加了不少共同语言。他们促膝相谈，谈古论今，从诗词文章说到养生治病，并同游蒋山（注：今钟山），作诗唱和，约定相邻卜居。这是宋代两位杰出历史人物的和解，显示出了他们坦荡的胸怀与君子之交的赤诚。

元丰八年（1085）三月，神宗驾崩，即位的哲宗年幼，他的祖母太皇太后高氏听政，重新启用旧臣，苏轼突然被任命为朝奉郎（注：文职散官）、知登州（注：地在今山东蓬莱）。同月，司马光奉命执政。



在多位旧党重臣推荐下，尚在赴登州途中的苏轼又被加封为礼部郎中（注：掌管部属各司事务的官职）。这时，苏辙也被任命为右司谏（注：谏官）。到登州才一个月，苏轼即被急召进京，年底被任命为起居舍人（注：负责记录皇帝言行），次年又升任中书舍人（注：负责起草经中央行政机构下达的诏令）。苏轼平步青云，而执政的旧党元老、时任门下侍郎（注：皇帝近侍）、受命执政的司马光与新党中坚、时任知枢密院（注：掌管军事）的章惇水火不容；司马光一定要尽废新法，章惇则常取笑羞辱司马光。苏轼一方面劝章惇尊重司马光，另一方面劝司马光按实际情况区别对待新法。在是否废除给田免役法问题上，苏轼与司马光也起了争执。司马光的固执态度，气得苏轼回府连连呼喊：“司马牛！司马牛！”这番经历，对苏轼否定非新即旧、非黑即白、非对即错的僵化思维有深刻影响。

本来苏轼就赞同新政中削减皇族特权、修整军备等项，现在又对旧党全面废除新法公开表示不同意见，这就使以苏轼为代表的“蜀学”和以司马光为代表的“朔学”、以程颐为代表“洛学”由学术文风分歧激化为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苏轼看不惯程颐骄横冷漠的道学面孔，程颐斥责苏轼在黄州言行放肆。“洛学”派狠下毒手，其手段毒辣卑劣超过当年制造“乌台诗案”的新党。元祐六年（1091），“洛学”骨干诬告苏轼的诗句“山寺归来闻好语”^①是听到神宗驾崩的消息而发。后经查，这是苏轼在移置汝州时闻知获准宜兴居住所作，写作目的是歌颂神宗皇帝并感恩朝廷的。虽然诬告者被贬，又提拔苏轼做了翰林学士（注：皇帝秘书）、知制诰（注：负责草拟直接以皇帝或朝廷名义下达的诏诰）等高官，但“洛学”派、“朔学”派的弹劾诬告不断。苏轼疲于应付，看到危机四伏，于是便屡屡请求外任。由于“洛学”派、“朔学”派从中作梗，太皇太后欲委任苏轼为执政重臣的意图始终未能实

^①黄任轲、朱怀春校点，《苏轼诗集合注》第三册，第128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1994年印刷。后续引文只简化注释。

现。苏轼欲干不能，欲罢不忍，思想相当苦闷。不过在中央居官，还是使他眼界开阔，深知国计民生。

元祐四年（1089）三月，苏轼以龙图阁学士（注：皇室秘阁顾问，虚衔）身份，知杭州。七月到了杭州，他首先拜谒了孔子庙，并解决了学子吃饭问题，迅疾以铁手腕囚禁了聚众闹事、挟制官吏的颜姓豪强。他发现杭州这块锦绣江南的风水宝地正遭受严重的灾荒，水旱相连，粮食歉收，粮价暴涨。他一方面不断上书，请求减少上缴的供米、免除运粮商船税，想方设法筹集救灾资金。另一方面，上任仅三个月，就迫不及待地开工治理运河。他为什么急着要搞治河工程呢？因为运河干浅，船只出入困难，柴米运不进来，价格暴涨，为民生计，必须治河。这两招还真见效，平抑了米价，稳定了人心。苏轼不是那种只顾眼前政绩的浅薄官员，他在认真思考：为什么这么富饶的地方却不能旱涝保收？他走访百姓耆旧，终于形成了河湖渠井综合治理的一整套从根本上解除水旱灾害的水利工程方案。他不顾某些掌权官员的反对，又克服了资金不足、劳力缺乏种种困难，于元祐五年（1090）四月二十八日以疏浚西湖、修建长堤为重点的杭州水利综合治理工程开工。这项工程深得民心，杭州百姓竭力相助，上下齐心，工程进展神速，仅百日主要工程即告竣工。苏轼因此赢得朝野赞誉，西湖长堤被后任太守林希命名为“苏公堤”。苏轼还多次亲往灾区巡视赈济，用官府节余钱两和自己捐献的五十两黄金，建立医疗机构“安乐坊”，集中救治危重患者，并派员前往时疫流行的坊间送医送药，救活了很多病人。这一年虽是大灾之后，但百姓能得温饱，盗贼绝迹，除夕监狱竟然一空。苏轼知杭州，仅一年零八个月，政绩突出，且有不少佳作问世。其杭州水利综合治理的经验，值得后人借鉴。

元祐六年（1091）二月，苏轼第四次被召回京城，任翰林学士承旨（注：翰林学士院主官）、知制诰。苏轼这次在京城任官只有两个多月，就被派任颍州知州。在颍州仅任职半年，被调任扬州，知扬州军事（注：任知州，并掌管当地军队）。又过了半年，苏轼第五次被召回



京城，任兵部尚书（注：兵部主官，负责仪仗、武举、地图等事项），后又兼任侍读并改任礼部尚书。苏轼在京城受政敌胁迫，举步维艰，在协助哲宗完成祭拜天地的南郊大礼后，便急切地要求离京外任。

元祐八年（1093），五十八岁的苏轼遇到了厄运。八月，与他共患难的贤妻王闰之病故。九月，一直支持他、保护他的太皇太后高氏逝世。哲宗亲政，立即扭转朝政方针，重用章惇、李清臣等新党骨干。苏轼第六次被外放，以端明殿学士（注：皇帝侍从顾问）、礼部尚书衔，知定州军事州。北宋时，定州地处前线。苏轼到任即着手整顿军队，严明军纪，加紧操练，修整器械，扶持民兵组织弓箭社，为抗御金兵南侵做好准备。

新党复辟后，对旧党人士进行疯狂的报复，苏轼树大招风，虽并不属于旧党顽固派，仍被当作旧党代表人物加以残酷打击。在定州仅半年，朝廷以诋毁先朝罪名褫夺苏轼端明殿学士、翰林侍读的虚衔，一贬再贬，后流贬惠州安置，约两年半的时间。此时的苏轼与“乌台诗案”入狱及流贬黄州时完全不同，已没有丝毫的矛盾、惶恐、愁闷心绪，他已看透朝政、参破荣辱。他携带佛像南行，思想并不消极；虽不掌权，但尽可能用自己的影响为百姓做些好事。他曾向江西庐陵（注：今吉安）和广东博罗、龙川的地方官推广新式农具秧马。广州因飓风受灾，他函请时任广南东路（注：今广东）提点刑狱的表兄程之才前往视察以利救助。地方上压低米价向农民超额征税，他也提出减税办法。惠州东的桥、堤废坏，他多方求助修复，自己捐出了犀牛皮腰带换钱充资；桥、堤修好，成为一处景观，惠州也有了“苏公堤”。知州詹范在收敛因兵荒马乱而暴露于野的枯骨，修坟埋葬，他也倾囊相助，并亲撰祭文。当时广州饮水苦咸，春季疫病流行，他建议引山泉水入城，并设立病院防病治病，广州知州王古听从了他的意见。他以诗言志：“日啖荔支（注：支，通“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①但在惠州他也

^① 《苏轼诗集合注》第五册，第2066页。